

代言、協商與認同——五〇年代女性文學中 臺籍家務勞動者的文本再現

王鈺婷*

摘 要

家務勞動幫傭工作在臺灣社會存在已久，尤其是在臺灣近代史重要轉折時期的五〇年代，有不少文化背景和社會經濟地位較為優勢的外省女性，將家務勞動工作轉移給經濟較劣勢的臺籍女性。如果我們將性別、階級與族群三者串連所形塑的交切議題，帶入五〇年代女性文學研究之中，會發現這些在族群和階級上處於雙重邊緣地位的臺籍女性家務勞動者，往往無法掌握再現機制，必須透過外省籍女作家筆下才得以顯影，某種層面上，外省女作家也提供臺籍家務勞動者介入再現政治的可能。本文借鏡史碧娃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所提出之底層論述議題，來探討外省女作家謝冰瑩、葉蟬貞、徐鍾珮、鍾梅音以臺籍家務勞動者為主題的代表性作品，指出以外省女作家作為敘述主體之論述機制問題，並論析其中所牽涉複雜「再現」（representation）性別政治議題。

關鍵詞：五〇年代女性文學、臺籍家務勞動者、再現政治、史碧娃克、底層論述

* 國立清華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副教授。

From Representation to Acknowledgement - The Narrative Representation of Taiwanese Domestic Workers in Women's Literature during the 1950s

Wang Yu-Ting

Associate Professor, Institute of Taiwan Literature,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Abstract

Domestic work, long part of the social fabric of Taiwan, was particularly prominent during the 1950s, a transformative period in the country's modern history when many relatively affluent émigré women from Mainland China retained relatively poor Taiwanese women as domestic workers. Research on 1950s women's litera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issues of gender, class, and group identity shows that female Taiwanese domestic workers lacked control over representational mechanisms due to their marginalization in terms of group identity and class. Therefore, their portrayal in the literature of this period was necessarily filtered through the perspective of Mainland China émigré authors. Thus it may be considered that these authors interjected Taiwanese domestic workers into the politics of representation. This paper uses the "subaltern studies" perspective of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to explore several representative writings on Taiwanese domestic workers written by émigré women authors including Ping-ying Hsieh, Ch'an-chen Yeh, Chung-pei Hsu, and Mei-yin Chung. Findings highlight the discourse-mechanism problems associated with having émigré authors as narrative subjects and critique the related and complicated issue of gender representation in politics.

Keywords: 1950s Women's Literature, Taiwanese Domestic Workers, Politics of Representation,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Subaltern Studies

代言、協商與認同——五〇年代女性文學中 臺籍家務勞動者的文本再現*

王鈺婷

一、前言

家務勞動幫傭工作在臺灣社會存在已久，並非外籍女性幫傭引進才成為臺灣社會獨特的現象，然而目前臺灣社會學、性別研究的學者普遍關注於外傭政策的制定過程及其影響¹，也將探討的焦點放在東南亞籍女性勞動者的勞動關係與身分認同²，在此一議題的相關研究上，不論就內容的廣度和深度而言，都累積了相當的學術成果。如果我們將視角轉回臺籍家務勞動方面，在一九五〇、一九六〇年代，臺灣的幫傭工作曾經興盛一時，尤其是在臺灣近代史重要轉折時期的五〇年代，由於政治上的劇烈轉變，以及新舊移民在移入與撤出中對人口結構進行重整，五〇年代文壇有不少文化背景和社會經濟地位較為優勢的外省女作家，將家務勞動工作轉移給經濟較弱勢的臺籍女性，外省女作家多聘任臺籍年輕女孩幫忙操持家務，並擅寫「下女」，稱之為「下女」現象，也由於五〇年代女作家專寫瑣碎、專寫下女，甚而有「下女作家」之譏評。³在此我們先不採取反轉傳統文學位階（literary hierarchy）的論述

* 感謝《成大中文學報》審查委員之專業意見。本文宣讀於 2013 年 10 月 11-12 日由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和臺灣文學研究所、亞太文化研究中心、性別研究室、臺聯大文化研究學程主辦的「性別正義：探索家庭、校園與職場的重構機制」國際會議，感謝臺大臺文所蘇碩斌教授的精彩講評，受益良多，特此致謝；並感謝會議上日本一橋大學社會學研究科洪郁如教授、清大歷史所鐘月岑教授之相關提問。

¹ 林津如：〈「外傭政策」與女人之戰：女性主義策略再思考〉，《臺灣社會研究季刊》39（2000.9），頁 93-150。

² 其中以最為人熟知的為藍佩嘉：《跨國灰姑娘：家務移工與臺灣新富雇主》（臺北：行人出版社，2008）。

³ 張瑞芬在專書中提到五〇年代外省籍作家中的「下女」現象，也反映現實生活環境，並提出當時有

策略，來重新評估女性文學因沒有涉及國家政治議題，在男性主流觀點下將其視為貶抑，而是想要深入探討「下女作家」所呈現的「下女」現象，以及其中所牽涉複雜「再現」(representation) 性別政治問題。

臺籍家務勞動幫傭工作不僅呈現出性別與省籍議題的複雜性，也觸及臺灣早期本省籍女性的生命史與生活圖像。如果我們將性別、階級與族群三者串連所形塑的交切議題，帶入五〇年代女性文學研究之中，會發現身為勞動階級以及弱勢族群的臺籍女性家務勞動者，不僅沒有受到特別的關注，也被排除在主流論述之外。這些在族群和階級上處於雙重邊緣地位的臺籍女性家務勞動者，多數在社會結構中被消音，抑或是無法掌握再現機制，往往必須透過外省籍女作家筆下才得以顯影。在此我們借鏡於史碧娃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所提出的底層論述的議題，來談五〇年代以臺籍家務勞動者為主要題材的書寫，以及其中必然牽涉到以外省女作家作為敘述主體之論述機制問題。

在族群與語言政策影響下，五〇年代臺籍家務勞動者多半是不具備論述能力的底層人民，而外省籍女性知識菁英則試圖讓臺籍家務勞動者「出聲」，所以不可諱言的是外省女作家相對於臺籍家務勞動者，不僅擁有書寫權力，也掌握著再現機制，所以，臺籍家務勞動者想要浮現出底層人民的聲音，必須透過外省籍女性知識菁英的撰述，才能於此一層層媒介(mediation)的有限空間中銘刻個人，因此，某種層面上，外省女作家也提供臺籍家務勞動者介入再現政治的可能。

五〇年代這批被戲稱為「下女作家」的外省女性知識菁英，包括徐鍾珮、葉曼、琦君、鍾梅音、葉蟬貞、蕭傳文、王文漪等人，這些女作家筆下到底呈現出什麼樣臺籍家務勞動者的樣貌？這一群女作家如何選擇自己的再現位置？她想要呈現什麼樣的下女形象？能呈現什麼？她所呈現的形象是否具有代表性呢？在此透過外省女作家謝冰瑩、葉蟬貞、徐鍾珮、鍾梅音以臺籍家務勞動者為主題的代表性作品，來

「下女作家」一詞來稱當時女作家，請參見張瑞芬：《臺灣當代女性散文史論》(臺北：麥田出版社，2007)，頁 129-132。另外，許珮馨的博士論文，也提到這群被戲稱為「下女作家」以下女為主題的散文，認為其作品真實地呈現外省族群和本省族群在「家庭」體制內所進行的族群融合之痕跡，請參見許珮馨：《五〇年代的遷臺女作家散文研究》(臺北：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論文，2006)，頁 152-153。

論析外省女作家「再現」的意圖與諸多議題。

二、底層人民論述的媒介問題與論述機制

如果我們帶入後殖民女性主義（post-colonial feminism）的思考框架，後殖民印度學者史碧娃克對於第三世界女性的研究集中表現在她的底層研究之中，史碧娃克在多年研究進行階段性地總結後提出〈底層人民能說話嗎？〉（“Can the Subaltern Speak?”），她通過研究底層女性的處境，指出在西方理論中心與政治威權中心長期以來都是以西方白人男性為主體的思考模式，忽略了屬於邊緣女性、有色人種、從屬階級的發聲角度，尤其是西方對於底層女性的再現，也造成底層女性話語權的喪失。⁴史碧娃克使用解構主義的方法賦予「底層」更靈活多變的定義，從「策略性本質主義」的概念來凸顯並非存在一個固定不變的底層階級，在此也援引史碧娃克對於底層的定義，來指陳臺籍家務勞動幫傭，與知識菁英、國家權力中心相對的發言位置。

史碧娃克所提出〈底層人民能說話嗎？〉藉由印度寡婦殉夫的案例，與後結構主義者、西方女性主義者；以及南亞底層研究群（South Asian Subaltern Studies Collective）進行對話。在此史碧娃克分別批判底層研究小組的男性中心傾向、後結構主義者的知識分子本位，以及西方白人女性主義的自我中心，尤其是瞄準後兩者的理論話語，提出了自己的底層女性理論。首先，史碧娃克引述傅柯（Michel Foucault）和德勒茲（Gilles Louis René Deleuze）的對談，她追溯了馬克思主義「代表」（英譯為 representation）的學說，指出代表德文 *vertretung* 此一詞語有兩種不同含義，一為政治再現；另一為德文的 *darstellung*，為審美再現之意，以說明掌握權力霸權的西方知識分子混淆代言與再現的謬誤，如同史碧娃克所言：「這些理論必須

⁴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著，張君玖譯：《後殖民理性批判 邁向消逝當下的歷史》（臺北：群學出版有限公司，2006），頁 232-351。

注意再現中的世界佈局——其書寫的場景，Darstellung——粉飾了其對『英雄』、個人、父權代理人、權力執行者——Vertretung——的選擇與需要。」⁵，並認為西方知識分子以政治再現之名代替底層發言，從而抹擦其差異性並剝奪他們的聲音。

其次，史碧娃克也直指西方女性主義者在寡婦殉夫認識問題上所可能具有的錯誤，認為英美女性主義者面對寡婦殉夫的兩種解釋，並沒有提出殖民者和本土民族主義者之外的第三種說法，也將第三世界底層女性的身體視為反映第三世界落後，且需要協助之客體。所以，不論是後結構主義者或是英美女性主義者，史碧娃克皆在其身上看到了保有西方主體位置的傾向，而將自身做為代言者的利益與第三世界被壓迫者的慾望混為一談，這也使得史碧娃克發出這樣的喂嘆：「從屬者能夠發言嗎？菁英要如何去監督那持續建構新從屬者的過程？在這樣的脈絡中，『女人』的問題似乎是最值得商榷的。」⁶在此，史碧娃克主要籲求知識分子注意再現所涉及的倫理議題，認為知識分子無論從哪一方面來代替底層發言，都極有可能忽視不同底層之間重要的社會差異，而造成底層階級啞啞的狀態。

然而，史碧娃克運用解構主義和女性主義的方法，一方面提醒知識分子要警惕自身利用特權位置，來試圖代表底層女性說話；另一方面她也反對知識分子放棄對於底層的再現，而是籲求知識分子貼近底層人民，以呈現出底層女性的聲音。在〈底層人民能說話嗎？〉最後一小節中，史碧娃克描述印度獨立運動中年輕女孩巴都利（Bhubaneswari Bhaduri）的故事，巴都利無法執行被指派進行的一項政治刺殺任務，又不願意違反組織紀律而決定自殺，她為了證明並非未婚懷孕而尋死，所以故意選擇在月經期間自殺，以示清譽，然而她死亡訊息還是遭到誤讀。在此，史碧娃克強調主流知識體系讓底層人民無法言語，從而造成剝削底層話語權的後果，而史碧娃克試圖重新講述巴都利參與反抗殖民主義鬥爭運動的故事，以解構德加女神「戰鬥母親」的神話，從而消解民族獨立運動中男性中心的敘述，並且讓巴都利發言：「在此一解讀中，布班納史瓦利·巴都利的自殺，一方面以一種不起眼的、個案的與從屬的方式改寫了『sati—自盡』的社會文本，另一方面卻也改寫對那位閃耀的、戰

⁵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著，張君玫譯：《後殖民理性批判 邁向消逝當下的歷史》，頁 297。

⁶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著，張君玫譯：《後殖民理性批判 邁向消逝當下的歷史》，頁 320。

鬥的與愛家的德加女神所提出的一種文化主流的說明。」⁷而史碧娃克也在反省本文的第一個版本後哀嘆地提出「從屬者不能夠發言」(The subaltern cannot speak!)的評論並不可取，而是必須為底層提供幫助，以正面訊息來解讀底層女性的案例，否則只是淪為此一噤聲體系的共犯。

如果把這個問題放在五〇年代臺籍家務勞動者生命故事的尋索來看，更能凸顯出史碧娃克提到的關鍵議題，既然底層不能夠自己發聲，那麼如何才能改變這種現狀呢？關於這個問題，我們可以借鏡於史碧娃克所提出的底層人民論述所牽涉的「媒介」問題與論述機制。目前關於五〇年代臺籍家務勞動者生命故事的文本再現，也凸顯出論述機制的議題，涉及到再現機制和媒介問題。五〇年代臺籍家務勞動者生命故事的文本再現，其一可以放在臺灣解嚴後大量口述歷史出現的脈絡來進行解讀，尤其是女性口述歷史的整理堪稱為此一現象的代表；其二可以進一步探勘由中國筆墨登臺的五〇年代女作家們，探究她們由中國到臺灣空間轉換的同時，於文本中如何再現臺籍家務勞動者的生命經驗。

前者關於臺灣解嚴後大量口述歷史的整理，其精神不斷強調作為主流歷史的補遺工作，不少女性主義者認為口述歷史能發掘主流之外的歷史書寫，保存婦女的聲音，有效地開發不同的婦女議題，口述歷史在填補面傳統歷史空白的前提下，也躍升為底層人民書寫的主要方法。⁸然而，如同黃慧貞所言，口述歷史展示了女性主義運動中兩造主張的不斷角力：「一方面要通過擴充歷史書寫去建立女性的現代主體性；另一方面堅持婦女口述歷史必然零碎和散亂的特質，對任何女性『主體』建立的努力存疑。」⁹這凸顯出口述歷史作為一種女性主義政治策略運用上的可行性，以及其中所顯現的矛盾性。在此將書寫臺籍家務勞動者的口述歷史視為豐富邊緣社群的歷史書寫，認為其也扮演著衝擊主流歷史記憶的角色，同時也關注於書寫本身所具有的高度政治性。

⁷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著，張君玖譯：《後殖民理性批判 邁向消逝當下的歷史》，頁 348。

⁸ 游鑑明：《傾聽她們的聲音：女性口述歷史的方法與口述史料的運用》（臺北：左岸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2）。

⁹ 黃慧貞：〈在空白與靜寂中述說異音——三個香港婦女口述歷史的文本政治〉，《媒介擬想》3(2005.4)，頁 87。

我們回到史碧娃克提醒知識分子必須長遠地反省無論從哪一方面來代表底層，都有可能忽視不同底層群體之間重要的社會差異，造成底層人民啞啞的局面；從另一角度來說，知識分子也有介入底層再現的責任，以便能更屬實地代表底層人民的觀點。在史碧娃克提出知識分子再現議題的影響底下，本文將不循九〇年代以來文化論述場域所討論的弱勢者如何取回自我再現（self-representation）的權利，或是底層家務勞動者如何衝擊主流文化想像，而是想從兩個議題切入，一者是就五〇年代女性文學而言，臺籍家務勞動者必須透過外省女作家的再現才能進入主流文學場域之中；這也牽涉到第二個重要議題：知識精英再現底層人民的倫理問題。誠然如史碧娃克所言，知識菁英必須從共謀消音中走出來，放下代言的特權，試圖讓底層人民發言，然而掌握知識權力的人是否能站在底層人民的立場替其設想，再現他們的想法，並為之發聲？或者並不瞭解被壓迫者的慾望，仍是從代言者自己的位置上為其代言，促使底層女性進一步喪失話語權呢？

由於五〇年代女作家夾處於多元與複雜的社會權力結構之中，再現臺籍家務勞動者時，必然考慮到個別女作家所身處的發言位置，在此也從後殖民女性主義取徑，不以單一性別概念來定義「女作家」，而是將族群、階級、文化、宗教、地域、語言等因素納入個別女作家的再現位置來進行探討，以多面向地呈現出一個女人認同裡的其他構成因素，來銘刻出五〇年代女作家所處的複雜社會關係。根據趙彥寧的歸納，遷臺的新移民女性，大致可以區分為三類¹⁰，依此分類，其中謝冰瑩、徐鍾珮、葉蟬貞都屬於隨同國家機器撤退的軍公教人員，徐鍾珮和葉蟬貞來臺前同樣任職於中央宣傳部，分別於《中央日報》及《婦女共鳴》月刊擔任記者與主編工作，謝冰瑩則是在 1948 年受聘到臺灣省立師範學院任教；而在普遍以高學歷為主體的五〇年代女作家群中，鍾梅音的寫作得自家學與自修甚多，她是屬於隨擔任軍職工程師夫婿遷臺的家眷，而屬於趙彥寧分析中的第三類。本文將指出由於不同女作家謝冰瑩、

¹⁰ 趙彥寧分析：「流亡來臺女性比率遠低於男，具有近乎決定性的政治與文化因素。我的研究和訪談資料顯示，流亡來臺的女性可大致區分為以下數類：一、奉國府令隨同國家機器撤退的軍公教人員；二、流亡學生與孫立人所辦女青年大隊隊員；三、隨同國家機器撤退的家眷。」見趙彥寧：〈戴著草帽到處旅行——試論中國流亡、女性主體、與記憶間的建構關係〉，《戴著草帽到處旅行》（臺北：巨流圖書公司，2001），頁 211。

葉蟬貞、徐鍾珮、鍾梅音等發言位置的介入，使得臺籍家務勞動者的面貌因而極為複雜，呈現出代言、協商與認同的幾種範式，頗值得一一探究。

三、代言底層女性：謝冰瑩與葉蟬貞之再現形式

家務勞動在父權體制之下被定義為女人的天職，父權體制將家事、老人照顧、托嬰等再生產勞動歸諸於女性責任。然而，透過五〇年代女性文學，我們看到了中上階層的外省籍女性僱用了經濟上相對弱勢的臺籍女性，來協助家務與照顧子女；外省籍女性則從家務工作的執行者躍升為家務工作的管理者。根據藍佩嘉的說法，她以 Deniz Kandiyoti 之「與父權討價還價」(bargaining with patriarchy)，來描述女性面對多樣父權箝制所發展出不同策略，刻畫出新富階級的臺灣女性經由雇用外籍移工來轉移她們的家務負擔，以及協商父權意識形態所賦予母親、妻子和媳婦的女性責任。¹¹同樣地，在謝冰瑩的例子中，我們可以看到外省籍女性雇用臺籍家務勞動者，也影響了兩者在父權體制中結構性關聯，有經濟資本得以將家務勞動外包的外省籍女性，也因為擺脫了家務勞動的束縛，擁有更多的空間。

謝冰瑩的〈下女〉，第一人稱的敘述者描述自己來到臺灣快兩年，只雇用兩個半下女的經驗談。第一位是十六歲女孩，原是養女，家境清貧而出外工作，但因辦事能力不佳，不但不會做菜，連碗和衣服也洗不乾淨，外表骯髒、不受孩子喜愛，只做三天就被辭退；第二位下女阿金雖能力很好，但卻脾氣大，禁不起玩笑，加上好高騖遠，受到外在環境的引誘，想找輕鬆但又高薪差事，只好請其另謀高就；第三位下女則有兩個孩子，和患有肺病的丈夫，卻因一再要求加薪、加上害怕她將家中病菌帶來等因素被辭退。¹²

Linda McDowell 在《性別、認同與地方：女性主義地理學概說》指出家裡有酬

¹¹ 藍佩嘉：〈女人何苦為難女人？僱用家務移工的三角關係〉，《臺灣社會學》8（2004.12），頁 51-52。

¹² 謝冰瑩：〈下女〉，《中華日報》第 7 版（副刊），1950 年 6 月 5 日。

家務工作，揭示了家庭、階級位置和種族差異之間的複雜交錯，認為這種交錯區別了女人，也造成女人之間的分化。Linda McDowell 提出美國家務工作不但有階級區分，也有族群分化，延續一組奴隸時期在家事服務中延續下來的兩極對比，使得白人與黑人女性相互對立，此種關係就以這樣的方式映繪於黑／白二分上，諸如性感／冷感、不潔／純潔、汙穢／清潔、動物／人類、放蕩不羈／品行端正，因此骯髒的家務工作就由本身被建構為低劣和汙穢的人來擔任。¹³在〈下女〉一文中，第一人稱敘述者筆下，除了第二位下女外，其他兩位下女皆被評斷為骯髒，尤其是第一位下女，在謝冰瑩描繪下呈現出天生智慧較低，無法自理生活的社會邊緣人之下女形象，也坦言她的髒樣，令人為之作噁：

她只有十六歲，穿著襤褸不堪的衣服，蓬鬆的頭髮，從來不梳，臉也似乎洗不乾淨。走起路來，老是一跳一蹦的，嘴裡整天哼著我們聽不懂的調子，有時像是日本歌，有時又像是臺灣歌。¹⁴

而第三位下女也因為「實在太骯髒，加之她丈夫的病，越來越厲害，害怕她把病菌帶到我們這個身體原來就不健康的家裡來」而被辭退，所以我們在謝冰瑩再現臺籍家務勞動者形象中發現汙穢、無知等諸多刻板面貌。敘述者在不愉快的僱傭經驗後，最後也只好回到身兼家務與工作的忙碌生活中，敘述者描述四個多月沒有雇用下女的悲慘生活，即是每天從早上六點忙到凌晨一、兩點，沒有休息過十分鐘，工作包括：洗衣、縫補、抹地、做飯、編講義改卷子，有時還筆文債，並且感嘆兼作下女之職，難以抽空寫短文：「如今我兼了下女一職更忙了，我有時偷空寫了一兩篇短文，以為換幾個稿費來可以買餅乾，麵包之類的點心來哄哄孩子，誰知因為用腦過度就動不動生病，打針和吃藥的錢，還不知要花費比稿費多若干倍，從此，我下了決心，再也不寫文章了，為什麼我要把腦汁換來的錢送給醫院和藥房呢？」¹⁵可見五〇年代有經濟資本的外省籍女性因為將家務勞動外包，也因此擺脫了家務的束縛，擁有

¹³ Linda McDowell 著，徐苔玲、王志弘譯：《性別、認同與地方：女性主義地理學概說》（臺北：群學出版有限公司，2006）。

¹⁴ 謝冰瑩：〈下女〉，《中華日報》第7版（副刊），1950年6月5日。

¹⁵ 謝冰瑩：〈下女〉，《中華日報》第7版（副刊），1950年6月5日。

切磋商藝的空間，並促成女性在父權制家庭中位置多重流動的可能性，女作家也在繁瑣的家務外包過程中，意外擁有較多靜謐的書房時光。如同蔡玫姿精闢觀察出臺灣五〇、六〇年代廚房空間的性別議題，認為女作家特別喜歡在窗、庭院編織詩意和靈感，整體而言，書房意象多過於廚房意象，書房成為心智女性締結的重要空間。蔡玫姿指出在張秀亞抒情美文中少見於廚房家務工作的描述，呈現出美文經驗差距裡的階層狀態，一則指向女作家內在接受書房成就自我的象徵，抗拒廚房滿足他人需求卻萎縮自我，一則指向社會結構原因——當時五〇、六〇年代盛行的童養媳與幫傭制度。¹⁶

回到〈下女〉一文，這其中所延伸的議題，當然不僅是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的先驅吳爾芙（Virginia Woolf）在《自己的房間》（*A Room of One's Own*）中所提示關於物質環境與書寫對於女性創作者的具體影響，吳爾芙提出女性從事創作時，面臨到外在物質條件（經濟收入和私有空間）的限制以及其對於女性發展潛意識的障礙，而在此要強調的是除了性別的差異之外，臺籍家務勞動者，確實減輕了部分外省籍女性的家務負擔，這種勞工階級幫助中產階級女性的形式，使得外省籍女性擁有公開創作的空間，呈現出階級結構差異所導致的書寫環境。史碧娃克在另一篇論述〈臣屬者的文學表現：一個來自第三世界的婦女文本〉（*Literary Representation of The Subaltern: A Woman's Text From the Third World*）中，藉由德維（Mahasveta Devi）的解殖文本對於底層女性 Jashoda 之身體刻畫，來進一步彰顯底層女性的異質性。史碧娃克於此批評西方女性主義者（馬克思女性主義、自由主義女性主義、法國女性主義）各自的侷限，史碧娃克認為自由主義女性主義者關注的是雇主階層女性從養兒育女中解脫，因而走向西方女性主義者所倡導的自主生活，史碧娃克敏銳地指出這些女性的自主恰好建立在對底層女性的壓迫上。¹⁷在謝冰瑩〈下女〉這篇刻畫外省僱傭階層女性如何與「印象不佳」的臺籍女傭相處的經驗，或許更可以讓我們關

¹⁶ 蔡玫姿：〈幸福空間、區隔女人、才女禁區——初論 1960 年後廚房空間的性別議題〉，《東海中文學報》21（2009.7），頁 351。

¹⁷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著，楊立平、景奉雷、張建立譯：〈臣屬者的文學表現——一個來自第三世界的婦女文本〉，《西方女性主義文學理論》（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頁 77-99。

注於階層女性結構所隱藏的一些問題。

然而，在此要特別指出〈下女〉一文也呈現出女性身分與族群、階級的複雜關係。〈下女〉中第一人稱敘述者坦言公教人員雇用下女的窘困現狀，無力負擔下女一再調薪之要求。其中，第二位下女阿金受到同伴們引誘，同伴提到有些外省人家裡做事最舒服，主人整天打牌、看電影、聽戲、跳舞，每個月光是賞錢，都是一兩百塊，工錢也是一兩百塊，敘述者只好一再把工錢提高，後因不堪負荷，只好請其另謀高就；第三位下女質疑敘述者過年像平日一樣沒有增添菜色，敘述者以此自我維護，卻也破綻連連：「我們外省人不講究過年過節，只注意平日的營養，天天吃肉，所以身體好。」¹⁸，這一段話相當值得玩味，因為它提醒我們去留意外省女雇主相較於臺籍女傭雖有優勢，但是這種優勢也是依附在雇主的社經條件上，當加入經濟因素考慮時，外省族群的資產階級亦有等級上的劃分。

以下，將延續史碧娃克於〈底層的文學再現：一個來自第三世界的女性文本〉之相關議題，來討論葉蟬貞以臺籍家務勞動者阿嬌為主體的作品。〈阿嬌的世界〉以倒敘的手法，運用女性成長敘述模式隱喻阿嬌的發展，刻畫出討人喜愛的阿嬌，如何進入敘述者的生活，帶給敘述者豐富的心靈感受。敘述者描述一名家住新竹的客家小女孩阿嬌，在母親與父親相繼過世後，小學畢業就必須到處找工作來養活自己，幫助哥哥嫂嫂養家，阿嬌先替大學裡的教授工作，而後輾轉北上求職，來到敘述者人口單純家中幫傭。敘述者刻畫阿嬌初到陌生環境，仍顯稚弱幼小，而後逐漸適應環境，不僅樂天開朗、手腳靈活，且做事踏實、有條不紊，又勤儉不浪費。〈阿嬌的世界〉著重於刻畫阿嬌成長受教與知識培養的過程，而且強調她身處於敘述者書香滿盈的環境中，逐漸點燃阿嬌心中的求知火焰，於是敘述者協助她每天從不間斷多練字，每天記日記，並將書架上的文藝書慷慨借閱，其中謝冰瑩的《女兵日記》、蘇雪林的《棘心》，這些風行一時的臺灣文壇探尋女性成長經驗的小說，都成為阿嬌的精神食糧，敘述者記錄下阿嬌樂於學習的情形：「她又開始學英語，而且進步很快。她每天練字，又天天記日記，文字也越來越流暢，還頗帶情感。此外她還為我抄寫

¹⁸ 謝冰瑩：〈下女〉，《中華日報》第7版（副刊），1950年6月5日。

文稿、剪貼、貼報、整理資料，這些工作她都能勝任愉快……」¹⁹這些展示出天資聰穎的阿嬌在敘述者引導下如何展現知識方面驚人的進步，無論舉止談吐都嫻雅得體。

阿嬌也在無私地幫助改善家中環境後，得到敘述者的支持和鼓勵，辭掉幫傭工作，一面在工廠工作，一面到夜校讀書，穿上嚮往已久的學校制服。敘述者特別呈現出臺灣經濟發展的情況，以勾勒出時代推進下女性的成長歷程，將阿嬌的成長與臺灣經濟的轉變做出某種程度的類比：

時間過得很快，阿嬌來我處已經兩年多快三年了。三年中臺灣的經濟已步向繁榮，漸漸由農業轉向工業，許多鄉村女孩都來到都市，進了工廠體會了群體生活，也吸收了許多新知識，經濟自立了，懂得追求幸福的將來，必須不斷追求新知。所以她們有志向的都是一面在工廠工作，一面進夜校讀書。一些工商職校、夜校、補習班也如雨後春筍般應運而生。那些學校錄取標準不高，對少時失學不幸的一羣很合適，也很有幫助。²⁰

〈阿嬌的世界〉的結局收束在敘述者親臨阿嬌於雙十節日上所舉行的結婚典禮上，順利完成學業的阿嬌，經由在校國文老師的介紹，覓得在軍中服役的如意郎君，在眾人的祝福聲中，終結長久的苦難歷程，走向幸福的前程。這部作品雖一再宣稱敘述者在阿嬌身上學到許多珍貴美好的東西，然而敘述者亦從阿嬌豐富的心靈寶藏中得到許多，然而，不論如何，我們所看到的是從外省女性為主的敘述者（narrator）不斷重述、回憶、編織她心目中的阿嬌成長故事，阿嬌真正的形貌為何並非本文爭論的焦點，重要的是阿嬌的再現於文本詮釋之初始即被刻畫為臺籍女性成長的文本。

回到史碧娃克在〈臣屬者的文學表現：一個來自第三世界的婦女文本〉中對於自由主義女性主義的解讀提出批判，主要是在批評西方女性主義對待第三世界文本的侷限性，史碧娃克認為自由主義女性主義往往將第三世界文本視為成長小說，雖然試圖喚醒自我意識、界定自我認同對於現代女性而言是深具意義，但是這也凸顯出在西方女性主義者眼中，第三世界底層女性，往往是需要協助的客體，反映出第

¹⁹ 葉蟬貞：〈阿嬌的世界〉，《青春》（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76），頁 190。

²⁰ 葉蟬貞：〈阿嬌的世界〉，《青春》，頁 191。

三世界的貧窮、落後，與受到父權制度的迫害與壓迫，而西方女性主義者則是幫助其建立需要發展的主體性。²¹從此一角度，〈阿嬌的世界〉也讓我們重新思索外省女性的敘述者將臺籍下女的故事再現為走向主體意識的覺醒，是否真的探詢出底層女性的主體性，力圖為其正名呢？還是反而凸顯出外省女性敘述者詮釋話語的侷限性？

四、僱傭間複雜的協商與界線之建構／重構： 以徐鍾珮〈嚐試〉為例

如果說，臺籍勞動女性形象及其故事，在謝冰瑩與葉蟬貞的文字及視角窺視下，難以發聲或是現形；而徐鍾珮〈嚐試〉一文中，則涉及外省女雇主與臺籍女傭之間複雜的協商。徐鍾珮〈嚐試〉藉由描述女主人和前後任女傭的相處，凸顯家庭勞動中的女主人和僱傭之間隱含的性別內部階序，並呈現出外省女雇主與臺籍女傭之間界線的社會建構與重構，也悄然觸及底層婦女發言的議題。

〈嚐試〉呈現出第一任女將因為家中客人太多，飄然引去後，第一人稱敘述者一直求才若渴、到處訪賢，以求再度聘請女傭。而親戚代為介紹一位年輕姑娘前來，這一次敘述者唯恐新來的女將拂袖而去，為此事事求全，初時女將不言不語，敘述者愛才之心更切。然而，兩週後女傭便鋒芒漸露，談笑自如，閒來無事，女傭引吭高歌，吟唱廣播劇的整齣戲文，從早練習到晚，家中充滿女傭嘹亮的歌聲。每逢女傭出外看戲回來，逮住敘述者滔滔不絕地講訴戲劇情節，連對白都不放過，讓敘述者不堪其擾。由於敘述者因第一任女將不辭而別，懷抱著女性主義平權意識的第一人稱敘述者對於新來女將期望做到下情上達，甚至鼓勵其對一切家事批評，造成女傭遇事大發議論，也不放棄發言權，連敘述者的事都要大加干涉，甚至連敘述者出門換衣，家中有人來借東西，都會發表高論。之後女傭漸漸和左鄰右舍熟識，朋友

²¹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著，楊立平、景奉雷、張建立譯：〈臣屬者的文學表現——一個來自第三世界的婦女文本〉，《西方女性主義文學理論》，頁 77-99。

日多，經常呼朋引伴，令人不得安寧，在敘述者的斥責聲中，她卻以女主人也同樣有朋友來並比，也對外人稱呼她為下女不以為意，而自言想回家再做一次小姐。〈嚐試〉一文文末卻透露玄機，敘述者描述這一名女將求去之後，耳根頓清，之後另請高賢，新女將只在自己的房間和廚房間走動，敘述者也滿意於安份守己的女傭，不再嚐試下情上達。

而在這篇散文中，透露出幾項訊息，文本裡的臺籍女傭經常出現跳槽的情形，主要是由於戰後大批大陸移民來臺，急需人手協助家務，臺籍女傭在供不應求的情況之下，自由進出勞動市場，也由於主雇之間沒有任何約束，而使得臺灣女傭來去自如。林津如的研究指出臺北幫傭業興盛一時，在 1950 及 1960 年代，臺北後火車站到處都是職業介紹所，從各地來的女性，馬上就有雇主挑選。²²其次，在此臺籍女傭身分和自我認同是多重的，具有身分認同的多樣性，並非只有呈現單一面向，除了勞動而沒有其他生活形態，〈嚐試〉一文臺籍女傭可以從聽廣播劇、外出看戲，與朋友互相往來，短暫地離開勞動生活的苦悶。其三，在此臺籍女傭並非是任人指使，而是會利用機會為自己扳回一城，翻轉原來的主從關係，顯示出底層人民發言的能動力，極有可能挑戰到中上階級論述掌握者的權力。比如說文中提到此任女將將敘述者的脾氣摸得一清二楚，連罵人的名詞也如法泡製，全都牢記，會挑一個適當時機以「太太真是傻瓜」或「太太神經病」來回敬²³，顯示出雇主和被雇者之間的階級和族群的界線雖然根深蒂固，但並非毫無翻轉之可能。然而，在這樣「下情上達」的空間，我們看到了權力的相對關係，底層人民的發言，巧妙觸及再現政治中自我與他者之間微妙的協商，〈嚐試〉中，第一人稱的敘述者便是在女傭兩個月的戲文練唱轟炸下，學會哼唱不熟悉的臺灣歌曲：「兩個月後，她的全套歌曲無形的都傳了給我。我無事坐著低哼時，竟全是臺灣歌曲，似乎我以前並沒有學過一支歌。我嫌煩地換哼隻新調，不行，還是學的她的。」²⁴可見底層人民發言權力與能動性的確是中產階級文化生產者所必須面對的挑戰。

²² 林津如：〈「外傭政策」與女人之戰：女性主義策略再思考〉，頁 123。

²³ 徐鍾珮：〈嚐試〉，《我在臺北》（臺北：重光文藝出版社，1951），頁 63。

²⁴ 徐鍾珮：〈嚐試〉，《我在臺北》，頁 62。

此外，饒富趣味，至今尚未有評論者關注的是〈嚐試〉一文，為何以「女將」此一詞語權充對於臺籍女傭的稱呼，而不採用當時輿論界慣用之「下女」一詞。先以〈釋「下女」〉一文，來從媒體再現的角度討論五〇年代的女傭問題。〈釋「下女」〉一文，指出下女在中國文學有悠久的傳統，以賦予正面象徵意涵，可以看到「下女」在主流意識形態下，建構出另一套表徵的系統。〈釋「下女」〉提到臺灣對女僕一律以「下女」或「阿X」稱之，「下女」一詞由日據時期流傳下來，以「下」相對於「上」，含有對女僕輕視的意思，李涓則別出心裁提出「下女」一詞源於離騷，屈原詩中的「下女」原意為神女的侍女，用此來勸告當「下女」的女性無須太過自卑。²⁵所以可見「下女」之詞語，在當時文化處境下具有相當負面意義，游鑑明取材於戰後在臺灣發行的24種報刊，對於當時受到輿論矚目的臺灣女性形象以及娼妓、女傭、婚姻等問題進行研究，游鑑明細緻分析女傭是一般家庭對於女性傭人的稱呼，戰後來臺的外省人發現臺灣人多半稱「女傭」為「下女」，這些論述一則為「下女」名稱溯本清源，認為「下女」頭銜不但不曾出現在中國社會，主要來自於臺灣本身特殊的日本殖民文化，「下女」一詞則被視為帶有奴化意涵；另一則則認為下女是對女性的一種貶抑，是十足階級的標誌，和臺灣「重男輕女」觀念有關。²⁶「下女」一詞放在當時「仇日」的時代背景下，所具有之負面意義並不令人意外，〈釋「下女」〉則從另一個角度將「下女」此一頭銜，放回中國文化的脈絡中，以宣示正統中國的基本立場。

再回到〈嚐試〉一文的脈絡中，「女將」一詞在文中出現七處，主要都是泛稱臺籍女傭，也以「朋友們閒時來訪，都談起駕馭女將的不易。一言不合，常會絕裾而去。而且下午決不管家裡是否有事，必然要出外尋訪親友。」²⁷來談到駕馭臺籍女傭之不易，主要是因為臺籍女傭性情不定，不安於工作環境，可知〈嚐試〉中所提到的「女將」，並非是中文詞彙脈絡下擔當大任的「女將」之意，反而接近在日本旅

²⁵ 李涓：〈釋「下女」〉，《中華日報》第6版（副刊），1953年1月29日。

²⁶ 游鑑明：〈當外省人遇到臺灣女性：戰後臺灣報刊中的女性論述（1945-1949）〉，《近代史研究所集刊》47（2005.3），頁198-199。

²⁷ 徐鍾珮：〈嚐試〉，《我在臺北》，頁61。

館業中擔任服務工作之女將（おかみ）²⁸，所以徐鍾珮在文本中以「女將」稱呼臺籍女傭，並未使用多數所稱呼的「下女」一詞，我們略可猜想，女作家在與臺籍女傭長期的互動之下，是否也衝擊自己的再現位置，發展出對於臺籍女傭不一樣的再現模式？

相對於女主人和臺籍女傭互動的複雜性，男主人對於此事採取隔岸觀火的姿態，也再度凸顯家務勞動存在著性別不平等。文中，敘述者遇到女傭在她不希望其發言的事，也有意見表現時，向先生訴冤，先生剛開始以「主張下情而上達的，不也是你」，讓敘述者啞巴吃黃蓮，而後遇到敘述者與女傭爭執，便懶懶說道：「下情上達，該是叔孫通訂朝儀」，最後在女傭求去，男主人無聲暗笑，說出：「就這樣結束了我家的民主政治？」²⁹在此顯示出丈夫對於女傭態度較為疏遠，主要是來自於傳統上女性家務工作被界定為女性專屬領域，男性則對於家務工作抱持著事不關己的態度，似乎不需面對家務勞動中的種種難題，反而可以一派輕鬆、幽默以對。

在《我在臺北》當中，有不少篇章都針對性別議題進行論辯，顯示出敘事者本身是充滿性別平等觀念的外省女性。徐鍾珮這一代從大陸來臺的五〇年代女作家，普遍受到五四運動的衝擊，性別意識較為開放，流露出頗為強烈的女性意識，《我在臺北》中〈熊掌與魚〉、〈為她們祝福〉等文，都頗具性別反思的意味。《我在臺北》代序〈熊掌與魚〉中，敘述者細述有才能的現代女性進入婚姻模式後進退兩難的困境，以及夾處在顧全家庭與自我實踐間的矛盾，寫出「家和工作，幾乎等於熊掌與魚，不可得兼，我常想兩菜同燒，結果兩隻菜都燒得半生不熟」³⁰的文句，坦言對於男同事有人欣賞和鼓勵其自我發展表示羨慕，揭示出現代社會結構裡依舊失衡的男女生涯發展之期待。〈為她們祝福〉則對於母職之於女性自我發展的殺傷力提出敏銳觀察。〈為她們祝福〉中，敘述者記錄在蔡太太家中聚會巧遇一大群太太，這些太太們自況如何為照料兒女而犧牲自我優異秉賦，成為將自己「我」字小寫的母親。³¹

²⁸ 此一論點受到日本早稻田大學文學學術院張文菁博士的提點與啟發，特此致謝。

²⁹ 徐鍾珮：〈嚐試〉，《我在臺北》，頁 61-66。

³⁰ 徐鍾珮：〈嚐試〉，《我在臺北》，頁 1。

³¹ 徐鍾珮：〈為她們祝福〉，《我在臺北》，頁 99-103。

所以，在〈嚐試〉一文中，敘述者具有明顯女性自覺，也充滿性別平等之觀念，這也影響了敘述者選擇再現臺籍家務勞動者的協商位置，也顯示出雇主和被雇者之間階級和族群的界線雖然痕跡深鑿，但是臺籍女傭非全然任人宰割，即使後者的機會是短暫的、零星的，但是也凸顯出僱傭女性在結構之內所展現的能動性。

五、詮釋他者，建構自我：鍾梅音的認同書寫

最後，我將討論鍾梅音文本中所呈現的臺籍女性勞動者形象及其再現意義。鍾梅音堪稱五〇年代女作家當中，留下最具規模與臺籍女性勞動者有關文本的作家，包括：〈阿蘭走了以後〉、〈阿玉〉、〈祝福〉、〈勝利者〉、〈靜靜的日午〉、〈自求多福〉等多篇，這些文本也具有高度典範意義。其次，鍾梅音的「臺籍女性勞動者」書寫，還涉及我們談到再現政治的一個重要理論關照點，即是再現和認同之間的密切關聯性，在此我們將討論鍾梅音以臺籍女性勞動者為主的文本中所涵納的再現政治意義，並觀察其中敘述者藉由他者來反襯自身主體位置之展現。

鍾梅音的〈有奴不知奴心苦〉一篇，可以瞥見鍾梅音所選擇再現位置，如何從女性一己性別身分，關切「階層化她者」的性別處境與生活境遇。敘述者提到由於家中人口簡單，加上整潔成性，許多瑣事隨手之間就料理好，所以家中下女一到下午便無事可做，於是便以此方便之門，放下女二、三小時的假，也反思最近兩年，因為家中大家懶散成性，下女因而一天到晚都有做不完的事，很少出門，敘述者繼而闡述：「故鄉以一句俗話：『有奴不知奴心苦』，自己也嘗過這滋味了，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再說下女以其勞力換取酬報，也沒有把整個自由獻出的義務，只要她能把份內事認真做完，為甚麼她不該有兩三小時的休假呢？」³²其中展現出同情弱小的女性知識分子，同理底層人民勞動和生活條件被剝削的狀況，尤其是敘述者體認到家務勞動確實繁瑣，且耗費心力與時間，希望臺籍女性幫傭在協助女雇主紓解家

³² 鍾梅音：〈有奴不知奴心苦〉，《小樓聽雨集》（臺北：大中國圖書公司，1958），頁126。

務勞動之外，也可短暫地離開勞務的苦悶，文本中提及家裡附近鄰居，常怪敘述者把下女寵壞，可見並不是所有家務勞動者都能夠有休假的權力；而一天下午二、三小時的假，對於這些平日缺乏行動自由的家務勞動女性而言是多麼彌足珍貴。

此外，〈祝福〉一篇，鍾梅音也摒除主從位置和權力關係，某種程度上試圖描繪出底層女性的聲音，對於臺籍家務勞動者阿珠因為婚姻不幸而必須以勞力換取薪酬的心理，皆有細膩剝切的描寫，投影出臺籍家務勞動者的生命史。從文本中我們得知，臺籍家務勞動者阿珠在母親逕自許配下嫁給鎮上出名的壞男人，前夫欺騙成性，又動輒對其拳打腳踢，之後因結識琉球女人而拋棄她。阿珠背著襁褓中的女嬰出外謀事，敘述者因為憐憫疼惜阿珠，而提高其工資，好讓她把小孩寄養在別人家裡，部分負擔其育兒成果，給予她較人性化的工作環境，也凸顯僱傭關係充滿人情味。在敘述者眼中，阿珠是敘述者來到臺灣三年多，前後用過七、八箇下女當中最單純、善良，也最具才幹，並且全力助其持家；而同一時間，阿珠也在敘述者所給予的慷慨和愛中，出落得容光煥發，感到自力更生的愉快。

〈祝福〉中最值得注意之處，在於外省籍女雇主和臺籍家務勞動者間的互動模式，外省籍女雇主並非嚴守或是再造雙方的階級差異以及日常生活中的公私領域界線，反而努力地去除僱傭之別。敘述者不只一次宣誓阿珠為家人，也談到目睹孩子以流利臺灣話和阿珠交談感到十分欣慰，流露出族群互動的善意。本文以〈祝福〉為題，更延續敘述者將阿珠視為家人的真切感受，提到對於阿珠另覓良緣的滿盈祝福，也在阿珠出閣臨別之際，於感傷的氣氛之下，衝動喊出：「我的家，仍舊是你的家，我這兒的溫暖，你仍然可以分潤，我這兒的快樂，你仍然可以享有！」³³的告白，令人動容。文末，敘述者細數阿珠的人格特質，包括：善良又懦弱，為人處世上有過份固執的矜持，不肯不勞而獲等，這也一再烘托出阿珠所具有的優美內在和崇高品性，不僅凸顯出敘述者對於阿珠的認同與敬意，也讓臺籍家務勞動者不再只是單一面向，或是僅只有刻版的表象陳述，反而具有內在的美德和信念。

在鍾梅音多部描述臺籍家務勞動者的文本中，〈靜靜的日午〉和〈阿玉〉這兩篇

³³ 鍾梅音：〈祝福（上）〉，《中央日報》第5版（婦女與家庭周刊），1951年4月18日。

作品相互對照，也巧妙促成同一臺籍家務勞動者阿玉在文本中先後唱和、互補互鳴。〈靜靜的日午〉主要刻畫一日之中最寂靜的日午時分，敘述者與女兒小白羊、阿玉三人於飯後，一邊吃冰鎮的香瓜，一面欣賞紗門外景色，敘述者生動靈活地描寫日常生活中的閒情逸致，頗有詩化現實的技巧，其中也略述阿玉的生命經歷。敘述者提到阿玉身世堪憐，父死、母嫁，十五歲即出來幫傭，沒有遇到同情她的主人，敘述者面對年幼，沒有受過良好教育的臺籍家務勞動者以父母之心相待，僅囑咐阿玉協助料理雜物和與小白羊作伴，做一些洗洗衣、跑跑腿、煮飯洗碗、看家應門等簡單事務，敘述者坦言：「因她年紀還小，我總覺對待這樣的小女傭，特別要存一些父母之心，對於她的不能稱職之處，要像寬恕自己的兒女一樣寬恕她，所以只要勉強過得去，我也就不計較了。」³⁴在此顯示出敘述者對於年幼的女傭表示同情，以較為寬容的方式對待。在〈阿玉〉一文中，鍾梅音以倒溯手法寫到阿玉終於走了，自己料理家務何等清閒自在，不僅午睡可高枕無憂，寫作讀書也無人擾其清境。敘述者提到阿玉雖然性情淳厚、心地誠實、品行端正，卻懶而貪玩，煮飯時碗盤齊鳴，廚房有如颱風過境，洗衣也頗有排山倒海之姿，繼而細數阿玉違反三大規則，一為參加下女大會；二為趁敘述者午睡偷溜出去遨遊；三為學會政治辭工，在此一鍾梅音對於臺籍女性勞動者描述的文本中，我們可以回溯女作家如何思考臺籍家務勞動者，又是如何看待自身和臺籍家務勞動者之間的關係，以及藉此探討外省女作家的內心狀態。

另一方面，論述者從自身角度詮釋他者形象的同時，也置入論述者本身之意識型態、道德觀、審美觀，以及思想體系，因為透過他者化的過程，也映襯出自我主體的位置：「再現包括了表意實踐與象徵系統。透過象徵系統，意義被生產出來，而這些意義將我們定位為主體。再現產製了意義；透過再現，我們可以對自己的生活經驗，以及『我們是誰』等問題有所理解。」³⁵在〈阿玉〉一文中，敘述者也在僱傭關係中，重新釐清自我，並透過敘述者所再現之臺籍家務勞動者形象，來建構起

³⁴ 鍾梅音：〈靜靜的日午〉，《摘星文摘》（臺北：三民書局，1969），頁140。

³⁵ Kathryn Woodward 等著，林文琪譯：《認同與差異》（臺北：韋伯文化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6），頁25。

自身的文化位置。敘述者認為管理傭人為麻煩事，尤其是透過再現阿玉，所投射的無非是女作家「自我」的位置。敘述者一再宣稱自己為胸無城府、拙於處事的人，認為暫時終止其和阿玉的主僕關係，以免演變為更壞的收場，敘述者如此現身說法：「我總覺用權術去待人，或把別人當做蛇蠍似的提防著，是我不能想像的苦事。雖然我也因此獲得一些品格高尚的朋友，而在名利場中，儘管與世無爭，仍不免遍體鱗傷，終至『落荒而走』。待傭人應屬細末小道，不料亦難處如此，笨的，我受不了；伶俐的，我駕馭不了。阿玉是介乎兩者之間，卻因年幼而一再被我姑息，又是如此散了，這一刺激，連帶把我做人的信心降到冰點！姑息與寬恕，這其間到底有些甚麼差別呢？」³⁶在文本中再現阿玉的段落都隱含敘述者聲稱自己在管理傭人上的既定立場，以及反芻自己在主僕相處上的應對進退，於是藉由僱傭關係之思考，也更深入地釐清他者與自我之定位。

在〈勝利者〉一文，敘述者再現臺籍家務勞動者阿鑾的過程中，往往不自覺地置入自身的情緒與想法，而在此敘述者自身定位之表態，更是本文著重梳理的重心。〈勝利者〉刻畫阿鑾趁著敘述者一家出門日遊時趁機偷東西，敘述者因為有急事先行返家，恰巧目睹女傭阿鑾在衣物散落一地的肇事現場。阿鑾卻謊稱外人以手槍搶劫，敘述者只好報警處理，直到員警前來處理此一離奇的搶案，找到贓物，阿鑾還不肯承認偷竊的惡行。敘述者說明阿鑾是養女出身，由介紹所送來，二十二歲還未婚，其笨如牛，常常生病，看上去本性還算良善，半年後開始要求漲價，一年後家中開始丟東西，敘述者已於日前請介紹所另請高明。本文以「勝利者」為題，敘述者在警方協助下順利凶緝，但卻表態勝利者雖贏得勝利何只輕鬆，點出經歷這段女傭偷竊事件後，因為「他者」，而更深刻體驗了自我：「如果慷慨與寬厚是我的美德，但我的慷慨卻養成了貪婪，我的寬厚只助長了狡猾，這些美德又於我何益？我發現我的志趣，我的心靈，都已隨著我的身體一同憔悴！」³⁷可見書寫他者，有助於建構自身的文化位置，並重新審視自我和他者的相互關係。

如果，我們繼續探討，雖然鍾梅音和其他女作家相較更能體認底層女性被壓迫

³⁶ 鍾梅音：〈阿玉〉，《春天是你們的》（臺北：三民書局，1978），頁159。

³⁷ 鍾梅音：〈勝利者〉，《小樓聽雨集》，頁246。

的處境，然而，家務工作的僱用關係使得女人之間存在著階層劃分，也與階級與族群等權力關係彼此交織，所以鍾梅音文本中的臺籍家務勞動者形象，也具體呈現出具有僱傭關係的女人們彼此之間的利益衝突。在底層人民無法發言的宿命之下，女性知識分子代為發言，讓我們從歷史遺留的文本中約略拼湊出臺籍家務勞動者的形象，然而，文本的建構無疑包含了權力關係，女性知識分子掌握表述的力量，也從自身角度詮釋底層人民的形象，在建構他者形象的同時，投射出自身本位的想像，並且重新定位自己：「論述與再現系統建構了某些位置，在這些位置上，人們可以為他們自己定位，並可就其立場發言。」³⁸於是自我認同的轉變便藉由僱傭關係之思索浮上檯面，進入女作家的思考之中，以尋覓、設定新的身分定位。

六、結語

本文從五〇年代女性文學中以臺籍家務勞動者為主題的文本，來討論外省籍女性如何介入臺籍家務勞動者的文本再現中，從再現政治的角度來釐清臺籍家務勞動者如何呈現與定義，以及梳理這些特定呈現方式背後隱藏的意識形態，並探討其中所產生的文化意義。五〇年代女性文學中家務勞動者的文本再現，首先涉及到位居優勢位置的外省女作家，為不同族群和階級女性再現之議題，也呈現出再現過程當中權力交鋒的痕跡。由於外省女作家與底層家務勞動者之間具有發言權力位階之差異，而個別女作家之間結構性的殊異，也影響女作家再現位置的選擇。此一臺籍家務勞動者群像，也映照出五〇年代本省籍女性多重邊緣的處境，相較於外省女作家在政治、文化、經濟背景上的優勢地位，臺籍家務勞動者往往居於弱勢，在此除了瞥見雇主與女傭兩方社經地位、家庭背景、文化養成所形成的巨大反差，也由於女性的家庭僱傭關係，更進一步突顯女人之間的階級差異，並且由於這樣的階級差異，呈現出不同女人之間的社會形象與規範意義。在此一脈絡下，「再現」也涵蓋多重意

³⁸ Kathryn Woodward 等著，林文琪譯：《認同與差異》，頁 25。

義，因而也增添了此一議題單從階級與族群等意識形態之權力運作切入的困難度，所以本文以代言、協商、認同三種範式，切入再現臺籍家務勞動者形象的再現，也記錄下五〇年代不同階級與族群之女性，在家務勞動此一主題上密不可分的深刻關連、矛盾與相互對立，並藉此梳理性別政治、家國論述、文化身分、主體認同之間的辯證關係。

引用書目

- 李涓：〈釋「下女」〉，《中華日報》第6版（副刊），1953年1月29日。
- * 林津如：〈「外傭政策」與女人之戰：女性主義策略再思考〉，《臺灣社會研究季刊》39（2000.9），頁93-150。
- * 徐鍾珮：《我在臺北》，臺北：重光文藝出版社，1951。
- 許珮馨：《五0年代的遷臺女作家散文研究》，臺北：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論文，2006。
- * 張瑞芬：《臺灣當代女性散文史論》，臺北：麥田出版社，2007。
- 黃慧貞：〈在空白與靜寂中述說異音——三個香港婦女口述歷史的文本政治〉，《媒介擬想》3（2005.4），頁84-103。
- * 游鑑明：〈當外省人遇到臺灣女性：戰後臺灣報刊中的女性論述（1945-1949）〉，《近代史研究所集刊》47（2005.3），頁165-224。
- 游鑑明：《傾聽她們的聲音：女性口述歷史的方法與口述史料的運用》，臺北：左岸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2。
- * 葉蟬貞：《青春》，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76。
- 趙彥寧：《戴著草帽到處旅行》，臺北：巨流圖書公司，2001。
- * 蔡玫姿：〈幸福空間、區隔女人、才女禁區——初論1960年後廚房空間的性別議題〉，《東海中文學報》21（2009.7），頁337-370。
- * 謝冰瑩：〈下女〉，《中華日報》第7版（副刊），1950年6月5日。
- 鍾梅音：〈祝福（上）〉，《中央日報》第5版（婦女與家庭周刊），1951年4月18日。
- 鍾梅音：〈勝利者〉，《小樓聽雨集》，臺北：大中國圖書公司，1958，頁55-59。
- 鍾梅音：〈有奴不知奴心苦〉，《小樓聽雨集》，臺北：大中國圖書公司，1958，頁125-126。
- 鍾梅音：〈靜靜的日午〉，《摘星文摘》，臺北：三民書局，1969，頁139-143。
- 鍾梅音：〈阿玉〉，《春天是你們的》，臺北：三民書局，1978，頁153-159。

藍佩嘉：〈女人何苦為難女人？僱用家務移工的三角關係〉，《臺灣社會學》8
(2004.12)，頁 43-97。

* 藍佩嘉：《跨國灰姑娘：家務移工與臺灣新富雇主》，臺北：行人出版社，2008。

*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著，張君玫譯：《後殖民理性批判 邁向消逝當下的歷史》，臺北：群學出版有限公司，2006。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著，楊立平、景奉雷、張建立譯：〈臣屬者的文學表現——一個來自第三世界的婦女文本〉，《西方女性主義文學理論》，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頁 77-99。

Kathryn Woodward 等著，林文琪譯：《認同與差異》，臺北：韋伯文化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6。

* Linda McDowell 著，徐苔玲、王志弘譯：《性別、認同與地方：女性主義地理學概說》，臺北：群學出版有限公司，2006。

(說明：書目前標示*號者已列入 Selected Bibliography)

Selected Bibliography

- Cai, Mei-zi. “Xingfu Kongjian, Quge Nuren, Cainu Jinqu – Chulun 1960 Nianhou Chufang Kongjian de Xingbie Yiti” (Space of Happiness, Segregation of Women, Forbidden Zone for Women of Intellect: A Gender Study of the Kitchen Space in Post-1960s Taiwanese Literature) *Tunghai Journal of Chinese Literature* 21 (July 2009), pp.337-370.
- Chang, Rui-fen. *Tai Wan Dang Dai Nv Xing San Wen Shi Lun*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on Female Essays in Contemporary Taiwan). Taipei: Rye Field Publishing Co., 2007.
- Lan, Pei-chia. *Kua Guo Hui Gu Niang: Jia Ting Yi Gong yu Tai Wan Xin Fu Gu Zhu* (Global Cinderellas: Migrant Domestic Workers and Newly Rich Employers in Taiwan). Taipei: Flâneur Culture Lab, 2008.
- Lin, Jin-ru. “‘Waiyong Zhengce’ yu Nuren zhi Zhan: Nuxingzhuyi Celue Zaisikao” (The State Policy That Divides Women: Rethinking Feminist Critiques to the ‘Foreign Maid Policy’ in Taiwan) *Taiwan: A Radical Quarterly in Social Studies* 39 (September 2000), pp.93-150.
- McDowell, Linda and Tai-ling Hsu. *Gender, Identity & Place: Understanding Feminist Geographies*. (Translated by Wang, Chih-hung). Taipei: Socio Publishing Co., 2006.
- Spivak, Gayatri Chakravorty. *A Critique of Postcolonial Reason: Toward a History of the Vanishing Present*. (Translated by Chang, Chun-mei). Taipei: Socio Publishing Co., 2006.
- Xu, Zong-pei. *Wo zai Taipei* (I’m in Taipei). Taipei: Chongguang Wenyi, 1969.
- Ye, Chan-zhen. *Qingchun* (Young). (Taipei: Grand East Book Co., 1976), pp.181-196.
- Yu, Jian-ming. “Dang Waishengren Yudao Taiwan Nuxing: Zhanhou Taiwan Baokan zhong de Nuxing Lunshu” (When Mainlanders Met Taiwanese Women: Female Discourses in Postwar Taiwanese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1945-1949))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47, pp.165-224.
- Xie, Bing-ying. “Xia nu” (The Serving Wench), *China Daily News Weekend Supplement*, June 5, 1950.